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谢 雯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关键词] 杜诗;清诗;格调说;性灵说;“诗史”精神

[中图分类号] I207.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4-0116-03

On Style and Spirit of Du Fu's Poems and Theory and Creation of Qing's Poems

XIE We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Du Fu's poems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poetic theories and cre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Each poetic theory had its own focus, such as Du's poetic style, emotion and the way to use words. The poetic creation in Qing dynasty was highly fit with Du's "poem history".

Key words: Du Fu's poem; the poetry of Qing dynasty; style theory; temperament theory; spirit of "poem history"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重要的诗人,其诗作堪称中国传统诗歌的典范。杜诗成果丰硕,仅现存的就有1400多首,且在诗歌题材、主题内容、格律形式和艺术风格方面都是“集大成”者。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座高峰,尤其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一面旗帜,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杜诗蕴含的传统士大夫的自觉精神、沉郁悲慨的诗风、如同轨辙的诗法典范,给后人树立了标杆。唐以来,历朝学杜之诗人屡见不鲜,研杜之著作浩如烟海。在宋代,学杜诗之风气蔚为大观,欧阳修、苏轼等无不钻研杜诗以自用,尔后成为大家,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更是公开将杜甫奉为开山祖师,当时的诗坛亦有“千家注杜”的说法;明代亦曾有过学杜的热潮,无奈至明末复古诗法完全僵滞,“三袁”“钟谭”等人见势掀起了一场纠偏正颇的反复古运动。此后,明清易代,杜甫和他的诗歌则重新焕发了光芒。

在风雨飘摇的封建社会末期,面对闯入中原的异族统治王朝,清朝诗人更深切地体会到了杜诗“国破山河在”的悲恸,明末清初的大诗人几乎无人不学杜。这就从一开始奠定了杜甫在清代诗坛的地位,其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清诗理论与杜诗格调、诗法、情感

杜诗既是唐诗的高峰,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深刻的转折。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时至杜陵而圣,亦至杜陵而变”,乃至“嗣后为诗者,举不能出其范围”。既然不能出其右,那么是否善于习得“少陵自有连城璧”,则成为了诗歌能否成功的关键。对此,宋陈师道早有总结。他认为那些学习杜诗只在模仿表面的人“非善学者”,提出“学诗之要,在乎立格、命意、用字而已”。而清代有许多著

收稿日期: 2013-02-25

作者简介: 谢 雯(1989-),女,湖南长沙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名的诗歌理论,正是建立在对杜诗格调、诗法、情感等不同方面各有侧重地推崇的基础之上的。

清沈德潜立“格调说”,标举“和人情、厚人伦、匡政治”的社会功用,最早可追溯至《毛诗序》“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而将它与“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相联系,则不能不说是受到了杜诗典范的影响。杜甫“一生只在儒家界内”,其思想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诗歌中体现的忠君爱民的政治理想和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不都是沈德潜“格调说”所标榜的么?事实上,杜甫也确实是以“圣人”的形象影响着沈德潜的诗歌理论。沈氏《唐诗别裁集》评价杜甫,“少陵身迹乱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倦倦不忘,得圣人之旨矣。”而书名中的“别裁”二字正是来源于杜诗“别裁伪体亲风雅”。且在古代众多诗人中,沈德潜只为杜甫一人做了专集《杜诗偶评》,可见杜甫必是其最推崇、对他影响深远的诗人。

与沈德潜同为渔洋再传弟子的翁方纲则重杜诗之“肌理”,其创立的诗学亦是从杜诗“肌理细腻骨肉匀”中拈出“肌理”二字命名,足见杜甫对其诗学理论形成的影响之巨。是时,杜诗风行,无论是官方、学界都将杜诗奉为“诗中六经”,翁方纲全盘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其诗学研究中,一直是“唯杜独尊”的。自16岁学诗以杜诗入手,此后他一生的时间都将研注杜诗作为事业。

翁方纲学杜也颇具特点。他不似前人那样更多地看重的是杜诗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而是强调学习杜诗之诗法。其《石洲诗话》手稿本说学古人之诗,不必学具体样貌,而应该“造其深微得起肌理运转之所以然”,即“客实衔接乘承伸缩”。尤其强调杜诗之肌理细密,清晰可见,是为诗之楷模。他极力推崇杜诗的诗法到了近乎狂热的地步。在《杜诗附记》自序:“(杜诗)篇中情境虚实之乘承,笱缝上下之消纳,是乃杜公所以超出中晚宋后诸千百家独至之诣。”

与翁方纲几乎同时代的袁枚,也是清诗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所创的“性灵说”指引清诗走向了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性灵说”以“真性情”为核心论诗,凡诗强调一个“情”字。有意思的是,袁枚也对杜甫推崇备至。从传统诗学观点看,杜甫实在与“情”没有太多联系,袁枚对他的认识可谓是别开生面,既不标举诗史,也不深钻炼字,而赞“老杜长于言情”^{[1]183},特别赞赏刘锡五化用杜甫诗句“语必惊人总近情”直指自己心源泉。并将杜甫推

至其以“性灵”论诗的首要地位,仅《随园诗话》中就出现“少陵”57次,“杜甫”9次,以“杜”称杜甫的情况更是多不可数。且以“情”出发,对杜甫的评价有很多独到之处,如“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1]498},更是反对钱谦益等人以史注杜,“余读钱注杜诗,而知钱之为小人也”^{[1]556}。事实上,杜甫的所有时事诗确实都伴随着强烈的情感运动,有感慨、悲愤、反省、评议等性情的表达,是源自于杜甫个体的人格内涵的。其“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的理论与袁枚的性灵说正相吻合。袁枚认为“杜少陵、白香山创为新乐府,以自写性情”,^{[1]817}而时人评价“性灵句实逼香山”,虽袁枚强调去绝依傍,不是有意模仿,但也足见杜诗一派对其潜移默化影响。袁枚对杜甫这番独特的点评对后人影响极大,直接导致梁启超以“情圣”评杜甫,振聋发聩。只可惜这一派对“杜甫之情”的研究和学说,还没有像“诗史”精神一般,得到当今学术界的全部重视。

除此三派之外,还零散分布着许多在诗歌理论方面受杜甫影响的诗人。如叶燮以杜甫、韩愈、苏轼三家并举,提倡“生、新、深”的诗歌理论;顾炎武、吴嘉纪、李因笃三人深心学杜,沉郁慷慨而自具性情;孙枝蔚、方文等人提出学习元白新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艺术经验的诗歌理论,以上窥杜甫。

二 清诗创作与“诗史”精神的发展

晚唐孟棨在《本事诗》中首次对杜甫诗提出“诗史”这一概念,“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意味杜甫诗歌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经宋人不断标举,“诗史”则发展为对那些深刻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充满士人情怀作品的高度赞扬。

明末清初局势动荡。自吴三桂大开门户、清廷入主中原后,诗人们眼睁睁看着汉人山河一步步被异族权势所征服。国破家亡的悲恸让他们与身处安史之乱的杜甫产生了强烈共鸣,读起杜诗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其实早在北宋,爱国将领李纲就曾感叹,对于杜诗“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这种精神上的契合,使得清初诗人不自觉地以杜甫的现实主义指导自己的诗歌创作,关注社会现象,抒写现实生活。这些诗人以明朝遗民为主流,身历鼎革,目睹社会历史的重大变革,心情自是悲恸。作为文人,面对

国破家亡无计可施,惟有效仿杜甫,以士人之笔抒忠诚之心,纪目睹之事,以诗存史。

吴嘉纪是当时著名的遗民诗人,其诗歌尤重反映民生疾苦,同杜诗之“三吏”“三别”有着直接血缘关系。写清兵“扬州十日”大屠杀的残暴,“城中人流血,营中日歌舞”,与杜甫写安史叛军“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一脉相承;写清朝横征暴敛“里胥夜捉人”实承杜诗“有吏夜捉人”。清人陆廷抡赞吴嘉纪在“诗史”方面完全不亚于杜甫和元结,“吴子之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山咏《春陵》,何以过?”

由明入清的诗人除了遗民外,还有不少弃节仕清的“贰臣”。这些诗人虽认主清廷,但也并非完全忽视现实,面对满清的粗暴统治,也有不少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其代表当推以诗纪史的吴伟业。身在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之下,自身又亲历了两朝荣辱迥异的官场遭遇,吴伟业由春风得意“出将入相”沦为“贰臣贼子”。正是这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创作潜能,在叙事、抒情等诗歌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他的“诗史”精神主要寄托在他的叙事诗中,尤其是那些反映人民生活困苦、阶级对立矛盾重重的诗歌,直接受到杜甫“三吏”“三别”的影响。如《直溪吏》《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等。除了反映民生疾苦之外,吴伟业也很好地继承了杜甫以诗纪时事政治大事的传统。《瓠北诗话》:“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如《临江参军》《南陌园叟》《永和宫词》等作,皆极有关系。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3]其诗歌所写对象横向上涉及至王侯将相、歌女艺伎,触及社会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按时间顺序排列,可编成一部明清之际的历史教科书。由于此类诗歌大都取自当时的真人真事,其中不少为诗人亲眼所见、亲身所历之事,这也使得吴伟业的诗歌在“诗史”的道路取得了新的发展——《明史考证摭逸》、《明清史》等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都征引了吴伟业的诗歌以证史。可见其诗歌所叙之事确为信史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诗史”精神,吴伟业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也有自己独到、深刻的见解。他所谓的“诗史”是“史外传心之史”,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的社会功能之外,更重视通过抒发个体感受到的心灵震动来反映历史,只有这样,“即谓之诗史,

可勿愧”。

清初诗坛盛行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精神,后人追随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施闰章、朱彝尊等大家,他们学杜诗之精神,因事立题,反映现实。至清末,社会再生动荡,国力衰微,洋人入侵。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更是惊醒了许多沉睡在天朝美梦中的文人士大夫拿起笔来,以诗歌记录封建社会是如何走向末路的。鲁一同就是其中典范,也是清末学杜诗人的代表。面对国家危难,自幼饱学儒家思想的鲁一同深刻体会到了杜甫式的情感,创作了一大批反映国事民生的诗歌。其中,《读史杂感》和《重有感》八首,以组诗的形式对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进行了叙述。钱仲联《清诗纪事》评:“所为哀时感事之作,尤苍凉悲壮,足当诗史。”^[4]其《重有感》中“张公苦意绝天骄”化用杜甫“韩公本意筑三城”,“西风大树日萧萧”化用杜甫“大树日萧萧”等,钱先生称其为“嗣响杜陵”。他对“诗史”精神的发展体现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尤其是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能自觉地将这一封建社会未曾遭遇过的民族危机写入诗中,这使得他的诗歌中蕴含了一个杜甫未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主题。

清代诗歌虽处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日暮黄昏,但绝不是日薄西山的衰败,而是爆发了十足的后劲。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显示了自身良好的整体风貌。杜甫诗歌的格调、精神对清代诗坛的影响功不可没,他为清代诗人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提供了全方面、多角度的范本,大家各取所需,任选一面加以继承和发扬,就成就了所以清代诗坛姹紫嫣红、百家齐放的繁荣景象,无怪乎清代是继宋代之后的又一个杜诗学高峰。

参考文献:

- [1] 袁枚. 随园诗话.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 [2] 孟 棻. 本事诗[M]//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3:14.
- [3] 赵 翼. 瓠北诗话. [M]//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83.
- [4] 钱仲联. 清诗纪事[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885.

责任编辑:李珂